

撰写一部中国语言规划史

黄晓蕾的《民国时期语言政策研究》，是她博士论文的升级版。从2002年读博时渐入此域，到2005年完成博士论文，再到今日修改成书，前后十年矣！十年中，不管是生子理家，还是更换单位、承担新务，皆能就一个课题持续钻研，磨剑不辍，这种“咬定青山不放松”的学术定力、学术韧性，是一名真学者应具有学术素质，或者是学术品质。

民国时期于今不远，但是语言规划的素材并不易得。当年晓蕾作博士论文，以及之后完善论文，她都耐心收集材料，细心观察材料，精心编织材料。不急躁也不浮躁，“山中无甲子，寒尽不知年”，是一个真学者应具有学术心态，甚至是学术境界。

晓蕾这部书，全面描绘了民国时期的语言政策，记述了此期重要的语文思潮、语文团体、语文人物和语文事件，且在关注语音、文字等本体规划内容时，还涉及术语、新词、语体等。中国现代意义上的语言规划，始自清末之切音字运动，至今已百年有余。百余年来，语言规划的基本精神一脉相承。正因其一脉相承，所以研究民国时期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，不仅可以科学评价清末语文运动的历史影响，也有助于理解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的语言政策。民国时期的语言规划，也影响了中国台湾、香港和海外诸多华人社区，因而海内外华语读音标准一致，文体皆以白话文为正，且共有注音或拼音工具。研究民国时期的语言规划，自然也有助于了解海内外华人社区的语言今貌，把握其发展走向。晓蕾以其十年之力研究民国时期的语言政策，其功既在中国语言规划史，亦涉及当代各华人社区的语言生活。

语言规划作为一门现代学问，若从1959年美国语言学家豪根（E.

Haugen) 提出语言规划的概念算起, 仅有短短五十多年, 但是人类的语言规划实践却有着悠久的历史。五十多年的语言规划学研究, 侧重于研究现代, 而较少关注历史, 这无疑是一种缺憾。

中国不仅是文明古国, 也是世界上最早规划语言文字的国度之一。如先秦之“倡雅言”、“重正名”, 秦朝之“书同文”, 汉末之“熹平石经”, 唐代之“字样之学”等, 都是重要的语言规划; 历代之官修韵书字典、设学兴教、科举取士, 都是推行语言政策的有效举措; 在经学大师的论著里, 在语文典籍的序跋中, 常有语言规划之论。不过, 这一领域的材料收集不全, 研究不多, 其研究标高大约应是李建国先生之《汉语规范史略》。

中国是治史大国, 治史者众, 但治语言学史者寡。中国语言学史研究, 只是到了这个世纪之交才突然发热, 但关注中国语言规划史者, 仍是寂寂寥寥。而中国几千年语言规划的实践与学说, 相信是支撑语言规划学不可缺失的科学材料。我多年来不间断地研究切音字运动, 并对诸子百家有关语言的论述保持着兴趣。我的两名博士生高晓芳、孙春颖, 分别把晚清外语教学、明代语言规划作为博士论文选题。国家语委也曾设立“中国语言规划的历史研究”项目。但这些研究, 距离写一部厚重的中国语言规划史, 还有遥遥之路。

中国语言规划史的研究尚在起步阶段, 需从搜集材料做起, 需从断代研究做起。以史料作基础, 纵串为史, 抽象为论, 方能建立起中国的语言规划学说。参之以方国的事实与理论, 进而升华出普世之果。当前, 世界语言生活面临重大变化, 显现出一系列新特点, 产生着一个个新问题。如此形势, 呼吁着世界领域的语言规划。世界语言规划, 可以从中国的历史里, 从中国的学人处获得借鉴。

当今之世, 当今之学, 需要一部中国语言规划史。

李宇明

2013年4月20日

序于北京俱闲聊斋